

苏俄札记

俄罗斯书简

ELuoSi ShuJian

【印】泰戈尔著 董友忱译

俄罗斯书简

ELuoSi ShuJian

【印】泰戈尔著 董友忱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书简 / (印)泰戈尔著;董友忱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3
(苏俄札记)
ISBN 7-5633-4443-8

I. 俄… II. ①泰… ②董… III. 泰戈尔—R. (18
61~1941)—书信集 IV. K833.5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144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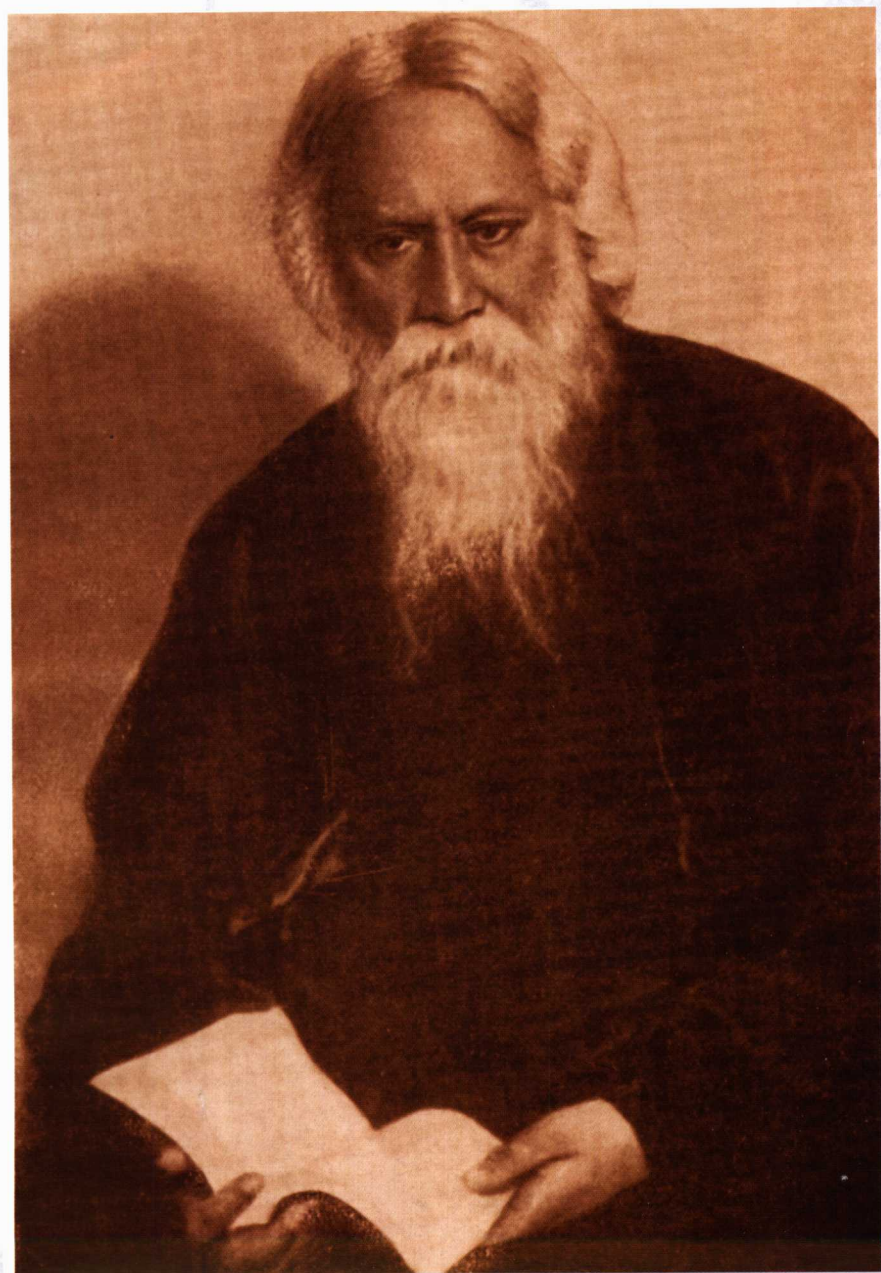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 6.75 字数: 150 千字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5 000 册 定价: 15.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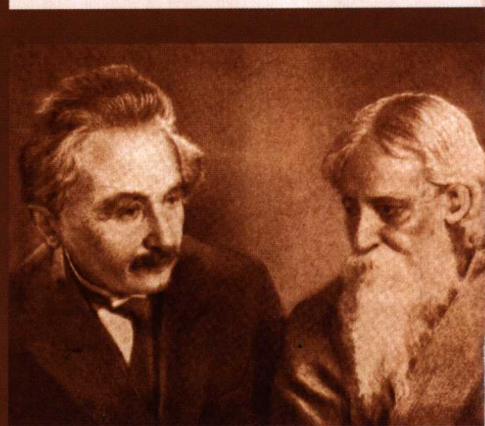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泰戈尔 (1930 年)

泰戈尔和爱因斯坦
(1930年，摄于柏林)

泰戈尔与爱因斯坦早在1926年开始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去苏联之前，泰戈尔访问过柏林。这是两位巨匠在柏林相见时的留影。随后，爱因斯坦的女儿——玛尔戈女士还与泰戈尔等人一道应邀出访苏联。





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1930 年）

145-9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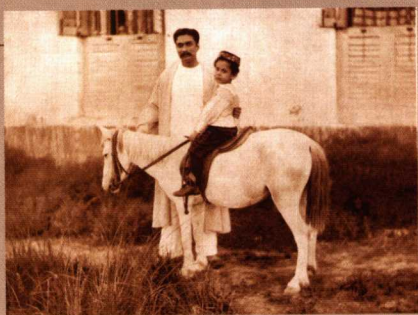
泰戈尔和他的孙女依蒂妮



泰戈尔的长女玛图莉洛达 (1886 ~ 1918 年, 享年 32 岁)

叔侄合影:

骑在马上的是绍民德拉纳特 (泰戈尔的小儿子), 站在旁边的是泰戈尔的侄子苏伦德拉纳特。



泰戈尔的女儿们和他的小儿子:

坐在中间的是长女玛图莉洛达, 站在后边的是次女蕾努卡 (1903 年 9 月——在泰戈尔的妻子病逝后不久, 因病死去, 时年 13 岁。她才华非凡, 有思想, 深得泰戈尔的宠爱), 右边是小女儿米拉, 左边是他的小儿子绍民德拉纳特 (1907 年 11 月, 因传染上霍乱死去, 时年 13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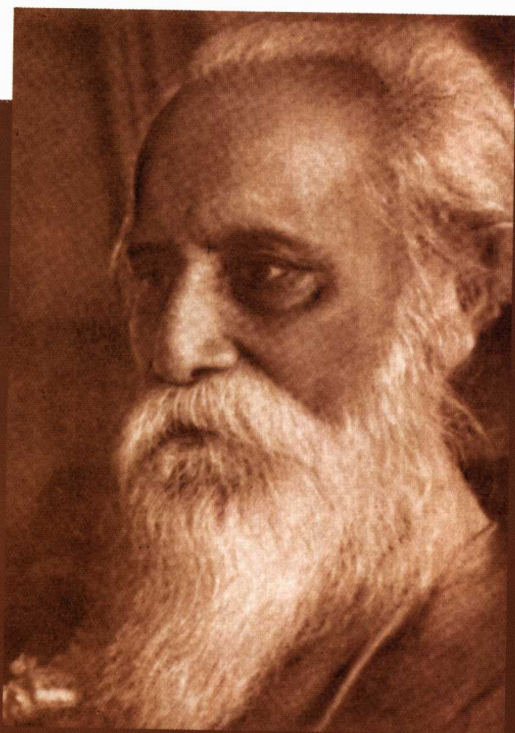




泰戈尔与莫斯科师范学院的师生们在一起（1930年，摄于莫斯科）



少年泰戈尔（1873～1874年）



暮年的泰戈尔（1941年，摄于圣蒂尼克坦）



编者前言

上个世纪 20 年代初至 30 年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日渐凸现,法西斯主义开始抬头。在这样的忧患年月里,东西方各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社会主义实验场”——苏联。

可是,当他们亲自踏上那块真实的土地时,反应又是多么的不同啊!

五四青年瞿秋白希望用“俄式革命”救治多灾多难的祖国,而同是东方作家,泰戈尔却断言:“……布尔什维克可能只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是这种疗法是不能持久的。”

法国的两位大作家、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者纪德与罗曼·罗兰几乎在同一时期访问了苏联。结果,前者是痛苦的失望,后者则留下了忧郁的“封存的日记”。

七八十年之后的今天,在苏联这座大厦的旧址上,只剩下一片寂寞的废墟了。在那些残垣断壁上,也许我们还能找寻到一些有益于我们的可资利用的“破砖与碎石”。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了鉴别,就会有发现。这是我们这套小丛书的基本主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5 月



柔和而犀利的目光

——泰戈尔和他的红色朝觐

(代译序)

岁月可以尘封一些事情，岁月也会像远去的潮汐，让一些因掩盖在浪花底下而不引人注意的东西裸露出来。泰戈尔 14 天的红色朝觐和那 14 封书信正是这样的例子。

1930 年，泰戈尔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而且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常常患病。就在这一年的金秋时节，泰戈尔应邀访问了苏联。在访苏期间和经由欧洲前往美国的途中，泰戈尔先后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写了 14 封信，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对苏联的种种印象和真实的感受。其中有几封信在孟加拉文杂志《侨民》(PRABASI)上发表。后来出了单行本，即现在的这个小册子。在泰戈尔的作品中，《俄罗斯书简》并没有占据突出的位置，它却向我们展现了泰戈尔作为诗人的另一个侧面。

在中国，泰戈尔是以诗人、文学家的声名而家喻户晓的。其实，泰戈尔也是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

泰戈尔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加紧对印度的掠夺和印度民族意识觉醒、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时期，这样的社会环境给泰戈尔以极大的影响。虽然他本人不是一个政治家，但他也

参与了许多政治活动。并且他数十年如一日,像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不惜倾其所有,先是在祖传的庄园,后来在什利尼克坦,身体力行从事教育和农村改造的工作,以他自己的方式介入了印度社会的历史进程。

而此时的苏联,作为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新型国家,已进行了13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是举世瞩目的伟大的人类社会实践。苏联的实践对泰戈尔来讲,无疑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他在信中将这次对苏联的访问称作是自己“今生的朝觐”。

那么,短短两周的访问,苏联给泰戈尔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

首先,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这让他又惊讶,又欢喜。他看到苏联各阶层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建设新生活的高涨热情,看到了苏联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新型的民族关系,看到了苏联在惠及广大民众的普及教育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都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向往的东西”,他怎能不满怀喜悦、欢欣鼓舞呢?他还十分赞赏苏维埃政权把人民群众从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因为“俄国革命者在十年内就把千百万人从愚昧和耻辱的社会底层拯救出来,并且不仅教他们读书识字,而且还教育他们尊重自己的人格”。他在第七封信中写道:“不管别的国家的宗教人士怎样谴责他们,反正我是不会谴责他们的。无神论要比宗教迷信好得多!”旗帜鲜明地站在苏联的一边。

他对苏联的热爱远不止于此。他甚至将苏联看成是自己理想的国度。看到苏联消灭了人剥削人、贫富悬殊的现象,人们都自食其力,他感到兴奋不已。同时,他也“自惭形秽”。泰戈尔在给他儿媳妇波罗蒂玛的一封信里写道:“他们正在把我的理想变



成现实,但是很遗憾,我自己却未能做到。即使不是这种情况,我也会感到羞愧的。”

显然,泰戈尔的心情源于殖民地的生活体验。访苏期间,泰戈尔常常拿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与印度加以比较。所以“朝觐”本身就包含有一种希望从中找到一些“济世良方”的愿望。然而,他绝不是自己所看到的苏联的一切事物的盲目崇拜者。他的目光是柔和的,也是犀利的。

比如,他虽然高度评价苏联的“普及教育”的成就,但对其教育制度上存在的缺陷的批评也是不留情面的。他说:“他们把教育变成一种模子,而按照模子铸造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如果科学理论不与活生生的人的头脑相结合,那么,总有一天不是这种模子破产,就是人的头脑僵化,而且人还会变成会动的木偶。”

泰戈尔的“朝觐”的着眼点在于人。在他的眼里,人类的福利高于一切。当他看到俄国革命者给人以解放、把被压迫者提到人的位置上时,他高声颂扬。然而,当他发现三十年代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政治现实与自己的内心尺度相抵触时,诗人的敏感和思想家的锋芒让他无法曲笔,激愤之词跃然纸上:“我还是觉得,他们不能正确地划清个人和社会的界限。在这方面他们同法西斯分子相类似。他们忘记了,削弱个人,不可能加强集体。如果束缚个人,那么集体也不可能获得自由。”他接着指出:“在这里是强大的个人在实行专政。这种个人掌握众多权力的制度,暂时也可能取得良好的结果,但是不可能持久,而且永远不可能使称职的领导人继承下去。”

泰戈尔继续论述说:“一方面使思想获得了自由,另一方面又要使它服从暴力——这是不容易做到的。胆怯的心理在不长的

时间内可能会起作用,但是受过教育的思想在谴责了那种怯弱之后,终究有一天会强烈地要求自己独立的思考权利。他们可以在肉体上压制别人,但是在精神上却做不到。那些想真正实行苛政的人们,首先就想扼杀人的精神,但实际上他们却在增强人们的精神活力。”

对于盛行的专政或者专制,泰戈尔毫不掩饰他的厌恶。他说:“在任何事情上我都不喜欢独断专行。我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从来都不使用伤害性的和惩罚性的威胁方法,或者使用恫吓的言行、表情,来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还写道:“我承认专政是一种巨大的灾难,并且还相信,这种灾难今天在俄国仍然在制造许多暴行。专政的一个消极方面就是强制;那是一种罪过。”泰戈尔对专政的解释是,“专政,也就是在国家事务中实行独裁”。他认为,“专政蕴涵着巨大的危险性,它的作用不可能谐调持久”,“专制的国家就处在这样的魔法之中——一个魔术师走了,另一个魔术师还会制造另一种咒语”。

泰戈尔还预言说,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政策不可能持久。他指出:“在当今这个病患时代,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可能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是这种治疗是不可能持久的。”

苏联的解体将泰戈尔的担忧和善意的批判变成了谶言。实际上,这恐怕并非是他所希望的。

董友忱

2003年12月5日于深圳大学

泰戈尔 (1861 ~ 1941), 印度著名的诗人、作家、社会活动家, 1913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作甚丰,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左拉》、诗集《园丁集》和《吉檀迦利》, 被誉为“诗圣”。其作品对东西方许多诗人均产生过深刻的影响。1930 年秋, 应苏联政府的邀请, 泰戈尔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朝觐”式的访问。他盛赞苏联在普及教育、民族团结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对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也流露出由衷的欢喜。但, 诗人对斯大林治下的政治现实十分反感, 并预言, 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政策是不可能持久的了。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 得到过北京大学的林承节教授, 四川大学的尹锡南博士, 广西师大的钟文典教授以及湛焕意、罗爱林两位博士的帮助, 特此鸣谢。